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双雄记

[法] 大仲马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双雄记



清·李汝珍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张海军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4-05403-2

I. 法…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作品综合集—法国
IV. I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905 号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张海军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0 字数: 25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04-05403-2/1·969 文库定价: 273.50 元

《双雄记》

大仲马

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因为父子都是法国著名作家,故世人称他为大仲马,称其子为小仲马。在他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这就使得他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十五岁那年,他被送到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当办事员。在这一阶段,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弥补了他所受教育的不足。并结识了几位热爱文学、颇有教养的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他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意大利小说和诗歌开始的,随后写了几个剧本。他的作品数量惊人,多达五百卷。大仲马于1870年12月5日在自己的海滨别墅中去世。《双雄记》是大仲马笔下最著名的一部描写战争的通俗小说。



告读者

《职责》的作者茹尔·西蒙是我的老朋友。一年以前，他请我为他的《大众日报》写一部小说。当时，我恰好在酝酿一个主题，告诉了他，他非常欣赏，当场就与我签定了合同。

故事发生在一七九一年到一七九三年间，地点是法国小镇瓦雷纳，时间是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逮捕国王路易十六的那天晚上。

因为从未去过瓦雷纳，我决定到那儿转转。毕竟，要写一本故事情节发生在我没有到过的地方的小说或剧本，对我而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尽管《大众日报》催得很紧，我还是让西蒙答应给我半个月时间充分构思后再动笔写这部小说。

去枫丹百路是为了写《克丽丝蒂娜》；去布卢瓦是为了写《亨利三世》；去布洛理和贝蒂娜是为了写《三个火枪手》；重游罗马是为了写《伊萨阿克·拉克汤》；除此之外，虽然我没去过耶路撒冷和科林思，我却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它们，或许，比我亲自去一次所费时间还要多。

这样做使得我的著作读起来更加真实，使我笔下的人物更加形象、具体，更加贴近生活、符合实际，以致有的读者后来竟真以为他们并非虚构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物。

甚至还有人亲眼见过他们！

所以，亲爱的读者，我告诉您一个秘密，不过，千万不要再说的给别人听。我不想和那些老实巴交的人过不去，他们干那种行当也仅仅为了养家糊口。当您去马赛时，便会有人将林荫大道上摩莱尔家的房子、卡塔尔居民区梅瑟蒂丝的房子以及位于伊夫岛上的邓蒂斯和法利亚曾经与之“朝夕相伴”的黑牢一一指给您看。

当《基督山伯爵》得以在历史剧院舞台演出时，却发现缺少一

张供布景师参考的伊夫堡的图画。于是我写信到马赛，请一名画家替我画一幅。后来，我拿到了画，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逼真得令人难以置信。画下注明：伊夫堡，画于邓蒂斯被扔到海里去的地方。

后来我又了解到，有一位正直的伊夫堡导游，专门经营据说是由法利亚长老亲手用鱼软骨做成的笔尖。

大家都知道，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不过是我虚构的。邓蒂斯当然不可能从伊夫堡上被扔到海里去，而法利亚长老呢？也不可能制什么鱼软骨做的笔尖。

这就是我要去实地调查的原因，也就是要在写这部小说之前去一次瓦雷纳的原因。这本书是在瓦雷纳开场的。

与此同时，瓦雷纳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烦恼。关于瓦雷纳的历史资料我看得越多，分析得越多，对于在那个地方逮捕路易十六，我越觉得不可思议。

因此，我邀请我的好友年轻的保尔·博卡勒与我同行。让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俊杰作这般旅行，他会从椅子上跃上火车的。

我们登上开往夏隆的火车。

抵达夏隆后，我们以一天十法郎的价格租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这是经过商榷的价格。

往返夏隆与瓦雷纳之间一次需六天时间，还有一天到瓦雷纳做各种各样的实地调查，这就是我们的行程安排。

在瓦雷纳，我确实确实认识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成为历史人物；而且，我更确切地认识到，在所有历史人物中，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算是最没有历史价值的了——这种认识您很容易理解。

我早已猜到了，但还不能确定。

惟一，而且是千真万确的，只有维克多·雨果——《莱茵河游记》的作者自己。

但是，维克多·雨果是诗人，而非历史学家。

倘如诗人愿意做历史学家，他们将多么优秀与伟大啊！

拉马丁曾经问我，他的《吉伦特党人的历史》为什么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因为您站到了小说的高度。”我回答说。

听罢，他良久不语，我相信，他最后对我的意见是持赞同态度的。

在瓦雷纳逗留了一天，参观了必须参观的地方，我将那部小说命名为《阿尔贡的勒纳》。

参观完毕，我和保尔就返回夏隆。

当时我儿子住在默伦附近的圣阿西兹乡下。我在那里有一个房间，那儿正是我将要写小说的地方。

我同亚历山大（小仲马）两人性格的对立恐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了。但我们共处时却非常愉快。各在一方时，肯定也曾有过一些美好的时光，但我相信，那些美好的时光，绝对比不上我们在一起时快乐。

到乡下三四天后，我开始动笔写我的《阿尔贡的勒纳》。可刚一开头，便停了下来，觉得无从下手。

讲些故事来解闷吧。

我突然回想起一个诺地埃（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讲过的关于四个参加了耶户一帮子的年轻人的故事，便给亚历山大讲了起来。他们最后在布尔被处决，临刑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情节悲壮，扣人心弦。

四个年轻人中死得最痛苦的，是一个令人难以下手的孩子，尚不足二十岁。

亚历山大全神贯注地听着。

“你猜，”他说，“我要是你，我会怎么办？”

“怎么办？”

“我就将《阿尔贡的勒纳》搁在一旁，去写一本《耶户一帮子》。”

“可你想想，《阿尔贡的勒纳》在我脑子里构思一二年了，差点

儿就完成了，怎么舍得放弃？”

“现在并未完成，那么就意味着永远也完不成了。”

“也许你说得对，但我要准备六个月才能重新进入角色。”

“哪里需要这么久！三天，三天后半部小说就问世了。”

“你帮我？”

“好，其中两个人物由我来写。”

“就两个人物？”

“你还想怎样？我还有我的剧本《金钱问题》要写，其余还得靠你自己。”

“那么，那两个人物是什么人？”

“英国绅士与法国军官。”

“先说说英国绅士吧。”

“好吧！”

于是，亚历山大详细地向我描绘了一下塔兰勋爵的形象。

“还可以，”我对他说，“现在再说说你那位法国军官。”

“他是一个神秘人物，一心求死，却总是事与愿违，以致他每每想让人杀死，却屡屡建下奇功，于是青云直上，战功显赫。”

“那么他为何寻死呢？”

“觉得活着过于乏味。”

“为什么觉得生活乏味？”

“啊，这本书的秘密也就在于此。”

“最后总得有个说法吧。”

“我若是换了你，肯定不讲。”

“难道读者不会问吗？”

“告诉他们自己找，这是一个答案不惟一的问题，应该给读者留些思考余地。”

“亲爱的亚历山大，如果那样的话，读者的来信会把我活活压死的。”

“你难道不会置之不理？”

“好吧，可是，为了使自己满意，我总得知道书中的主人公为何寻死吧。”

“啊，当然，对你是不必有所隐瞒的。”

“说说看，我洗耳恭听。”

“如果阿伯拉尔应征入伍，而非辩证法学者。”

“嗯——”

“如果一颗子弹……”

“嗯——”

“你知道，倘若他并未隐藏于巴拉克莱修道院，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竭尽全力使自己被人杀死。”

“哼！”

“怎么？”

“过于牵强。”

“牵强，这怎么说？”

“要让读者接受，过于牵强。”

“可你并不需要把这个告诉他们。”

“是这样。……是啊，我对于你关于此事的正确性我并不怀疑，不过……等等。”

“我在这儿，说。”

“在你的藏书当中有诺地埃的《革命回忆录》吗？”

“嗯，当然。事实上他的书我一本不缺。”

“去替我把这本书找来。我想起来他写过几页关于居荣、勒普雷特尔、阿米埃和伊凡尔的事情。”

“别人定会冠予你剽窃的罪名。”

“嗨！诺地埃在世时十分喜欢我，虽然如今已不在人世，但如果我向他要些什么，他又怎么会忍心加以拒绝呢？快，去替我找来。”

片刻后，亚历山大将书交到了我的手中。我打开书，翻阅了三百页，终于找到了。下面，亲爱的读者，请看看诺地埃的著作，于

您百益而无一害——这是他说的话：

“在阿米埃的一章里我曾经提到过的涉嫌抢劫驿车的几个强盗名字分别为：勒普雷特尔、伊凡尔、居荣和阿米埃。

“勒普雷特尔四十八岁，曾任龙骑兵队长，圣路易骑士。容貌高贵脱俗，神气自负，风度翩翩。居荣和阿米埃年龄都介于二十二至二十三岁之间，真名实姓从来不为人所知，或许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担心有损他们的姓氏吧，不过，谁又能说得清呢？但他们两人总是难分难舍却是不争的事实。伊凡尔生于里昂，其父是赫赫有名、富甲一方的商人。他仪表堂堂，举止潇洒，反应总是那么灵敏，动作总是那么迅速，眼中始终流露出激情，脸庞上永远洋溢着微笑。轻柔与刚强，温和与力量，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他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与良好的修养。最使人震惊的是他轻松愉快的神情与他的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人看了于心不忍。大家都认为他为人正直、本性善良、重感情、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办事果断、意志坚强，虽然有点儿女人腔。他向来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富有和没有一个敌人。这就是他，一个被指责犯了抢劫杀人罪的二十二岁的青年。

“这四个人的任务是在白天攻击一辆驿车，里面装载着四万法郎的政府公款。他们几乎是以彬彬有礼的方式进行的，没有丝毫伤害旅客的意思。旅客们也漠不关心。只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勇敢地夺过车夫的手枪射击劫车者。不过由于平时武器只装火药不装子弹的习惯，所以无人受伤。此举令马车中的人全都慌乱不已、不知所措，害怕劫车者报复。这个孩子的母亲吓得全身发抖，瘫倒在地。

“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吸引了强盗们的注意。有一个强

盗快步向那母亲走去，用最温柔的方式安慰她，祝贺她拥有一个这么勇敢的儿子，并立即把这几位先生随身备用的香料赠予她使用。她终于缓过气来，与此同时，其他旅客注意到，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那个强盗的面具掉下来了，可是没人看到他的脸。

“当时的警察局，未能阻止强盗的行动，但是他们有找到他们踪影的办法。甚至于咖啡馆、弹子房里休息、娱乐的人们也收到了通缉令，知道有人会掉脑袋。不仅罪犯们关心这种事，连平民老百姓也非常注意。果然，晚上当这些江洋大盗在社交场合像往常一样轻松愉快地谈论他们夜里勾当的时候，便被带到了邻省的一个法庭。除了国库，他们那次罪恶行径并未伤害任何人，而国库与任何人毫不相干，因为没有人知道国库到底是谁的。而只有那位漂亮夫人能认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但她又绝对不会这样做。所以，法庭裁决他们无罪。

“可是舆论的反应太强大了，以致警务部迫不得已提出上诉。法庭撤销了原判，但当局犹豫不决，可以说有些害怕，唯恐处罚了那些今后会被视为辉煌业绩而处处宣扬的过火行动。安省的布尔城法院审讯了几名被告，而在这个城里被告有不少亲朋好友以及拥护者和同谋。当局认为，只要把那些牺牲者再次带回，那个反对的政党就能满意，同时又认为，只要安全地保护好这几个牺牲者，也不会得罪另一个政党。把这些被告关进监狱就算是一次胜利。

“预审又再次开始，起初的结果和上次一模一样。四个被告都能证明自己当时不在现场。任何信心面对如此权威的证据都会丧失得干干净净。宣告免诉看来已毋庸置疑，但突然，检察长提出了一个可能是天意却很奸诈的问题，改变了当时的局面。

“‘夫人，’他问那位曾得到其中一个强盗热情关照的女人，‘你能告诉我在这几个被告之中，谁曾热心照顾过您吗？’

“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审问方式使她的思路混乱了。可能她以为事实已明，要她当面指认只不过是一种改变那个人的命运的方法。

“‘是他。’她指着勒普雷特尔回答。

“这四个被告都是用不在现场作为自己的辩词的，而四个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于是全部将断命于刽子手的刀下。他们笑容满面地站起来向她致敬。

“‘好哇！’伊凡尔重新落座，然后笑着说，‘队长，告诉您一件事，以后对女人应该殷勤备至。’

“据说，不久后，这位可怜的夫人在懊悔抑郁之中辞别了人世。

“依照旧例可以上诉，可这一次却没什么希望，因为当时革命政党力量又在抬头，尽管一个月以后即遭到拿破仑的镇压，但毕竟当时影响颇大，于是反革命政党过去令人可憎的暴行受到人们的非议。

“因而，法庭驳回了他们的上诉，可是司法当局并未得到最先通知，因为牢房围墙脚下三声枪响惊醒了犯人。这种内外勾结的事使负责法庭安全的督政府委员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地召集了一批武装力量，当时这支部队的长官便是我伯父。清晨九点，监狱院子的铁栅栏前就整整齐齐地排列了六十名骑兵。

“为了走进这四个可怜人的囚室，狱卒尽管竭尽所能——头天晚上就用结实的绳索和沉重的镣铐将他们牢牢束缚住——可还是很快被犯人制服了。囚犯们卸去了身上的枷锁，全副武装，把看守人反锁在囚室里，轻松地走出了牢门。又由于他们有了全监狱所有的钥匙，他们同样畅通

无阻地穿过监狱的院子。他们的外貌对于那些铁栅栏外的平民百姓而言无疑是十分恐怖的。为了使行动顺利进行，也许为了作出一种英勇无畏的气概——这种气概比和他们姓名相连的勇敢声誉更有威力，也许是为了流出的鲜血不太引人注目——鲜血在白布上很快会渗出，暴露了一个重伤者的垂死挣扎，他们都是赤身裸体的。他们胸前交叉的背带，红色宽腰带上的武器和狂热的喊杀声都显得有些古怪。当他们来到监狱院子里看到展现在面前的不可能冲破的静静伫立的宪兵队的时候，便停顿片刻，似乎是商量了一下，勒普雷特尔——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又是首领——举手向宪兵队敬礼致意，用他独有的高贵风度说：

“‘好样的，宪兵小伙子们！’

“然后，他热烈地与伙伴们作最后的告别，接着开枪自杀。居荣、阿米埃和伊凡尔装作要自卫的模样，枪管面对宪兵队，以引导宪兵们认为他们是在公然挑衅而开枪射击，其实三人压根儿就未开火。居荣倒在勒普雷特尔的尸体上，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而阿米埃的大腿在靠近腹股沟的地方被猛烈的火力打断。只剩伊凡尔一人了，他镇定自若，目光凶恶，两只灵活的手舞动着他的两支枪，以死相威胁。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赞赏这个秀发飘扬、身陷绝境、容貌漂亮的年轻人。他因从未让人流过血而闻名，可现在法庭要他以血赎罪，他像一只走投无路的狼一样在三具尸体上跳动。这种令人难以思议的可怕场景使这群宪兵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下。他发现了这种变化，妥协了。

“‘先生们，’他说，‘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我宁愿去死！但任何人都不许靠近我，倘若有人胆敢走近，我就会开枪——不过，除他以外，’他指着刽子手说，‘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这只是一个程序问题。’

“对于旁观者和宪兵队而言，作出这样的让步并不困

难，因为那儿没有人能再忍下心去看那场可怕的惨刑，都想让它早些结束。伊凡尔看到他们的让步，便把手中的一把枪咬在嘴里，然后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匕首，猛地刺入前胸，只余刀柄。他仍然立在那儿，显得对自己还能站着感到难以思议。人们都想向他冲过去。

“‘好样的，先生们！’他又朝那些打算包围他的人吼道。当他的鲜血从插着匕首的伤口大量涌出的时候，他又抓起两把枪，‘你们知道我们的协定：要么我一个死，要么我们三个一起死。我们一块儿走吧。’”

“大家让他向前走去。他径直走向断头台，并不时抖动胸口上的刀。

“‘是啊，’他说，‘我的生命力太强了，我不会死。想办法让这件事结束了吧。’”

“他请几个刽子手行刑。不一会儿，他就人头落地。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生命力的某种独特现象，他的脑袋在掉下来时跳了一下，滚到了断头台外面。在布尔直到现在仍会有人说，伊凡尔的脑袋还开口讲过话。”

我尚未看完就决定先搁下《阿尔贡的勒纳》，开始构思《耶户一帮子》。

第二天，我挟着旅行包走下楼。

“你又准备出发了吗？”亚历山大问。

“是的。”

“去什么地方？”

“布尔让布雷斯。”

“到那儿干什么？”

“参观一下，访问那些曾经亲眼目睹处决勒普雷特尔、阿米埃、居荣和伊凡尔的人，请他们讲讲当时的情景。”

众所周知，有两种办法可以从巴黎到布尔：一种是乘火车抵达

马孔，然后再乘驿车抵达布尔；另一种是乘火车抵达里昂，然后乘火车直达布尔。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该走哪条路。一个暂时和我坐同一车厢的旅客使我下了决心。他是去布尔的，他说，他在那儿朋友很多。他经由里昂抵达布尔，因此我决定和他同行。

火车到里昂时我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便抵达布尔。

王国的第二首都里昂的一份报纸发现了我，随后登载了一篇讽刺我的文章。

里昂自一八三三年起就对我心存不满，我猜是由于二十四年前我曾说过这个城市缺少文学味儿。

唉！我是个不轻易改变主见的人，直到现在我对里昂的看法还是同当时一样。

在法国鲁昂同里昂一样对我耿耿于怀。鲁昂对我所有的剧本，包括《埃尔马恩伯爵》，都嗤之以鼻。

曾经有一次，一个那不勒斯人向我夸口说他对罗西尼、拉玛利勃朗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和黛丝德蒙娜也曾喝过倒彩。

“可能是由于罗西尼和拉玛利勃朗也夸口说他们曾被那不勒斯人喝过倒彩。”我回答说。

因此我也夸口说我曾被鲁昂人喝过倒彩。

一天，一个真正的鲁昂人正好出现在我身边，我打定主意要摸清楚我在鲁昂被人喝倒彩的原因所在。

鲁昂人回答：“我们喝倒彩的原因在于我们恨你。”

我问这个鲁昂人，他和他的同胞又有什么理由恨我呢？我既没讲过他们苹果酱的坏话，又在巴尔贝先生任市长期间，始终尊敬有加，在他被文人协会委派参加伟大的高乃依塑像落成典礼时，我是惟一想到在他开始演说前行礼致敬的人。

在这些事实里，没有一个让鲁昂人憎恨说得通的理由。

因而我对“我们喝倒彩的原因在于我们恨你”这个不可一世的答案怎么也想不通。于是我低声下气地问：

“那么你们因何而恨我呢？”

“啊，这您十分清楚。”鲁昂人说。

“我？”我很吃惊。

“对，您。”

“无论如何，您就权当我不清楚吧。”

“您不会忘记您参加市政府为了高乃依塑像的落成典礼而举办的庆祝晚宴吧？”

“当然。哦，我明白了，是由于我并未回请而恨我。”

“不，不，怎么会是这个原因呢？”

“那么原因何在？”

“是这样的，在那次晚宴上，有人建议您以鲁昂的历史为题材写一个剧本。”

“我记得我是这样回答的：‘难道还会有比这再容易的事吗？只要你们要求，并且给我提供一个题材我就可以在这半个月里完成一个绝好的剧本，同时所有的收益我无偿捐献给那些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们。’”

“是的，您是这样说的。”

“我实在看不出在这些话里有什么得罪你们以致遭到你们嫌弃的地方。”

“对，没有。可是后来又有人问：‘您可以用散文写这个剧本吗？’对此您的回答是……哦，我想，您应该不会忘记吧！”

“说实话，实在抱歉，我已经记不得了。”

“您当时说：‘我想用诗句写，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写得快些。’”

“这样的话……哦，或许吧。”

“是吧！”

“不过，即使讲了又有什么呢？”

“有什么？难道这不是对高乃依的侮辱吗，仲马先生？不管怎么说，鲁昂人是这么认为的，并为此而恨您，而且还会持续很久。”

原来是这样！

据报纸报导说：“仲马只在里昂停留了一个晚上，原因可能在

于一个极其缺乏文学味儿的城市不配让他更久地待下去。

仲马先生从未如此想过。他之所以在里昂只停留了一个晚上，原因在于他急于前往布尔。因此，仲马先生刚到布尔便叫人带他前往省报报社。”

我知道那家报社的领导者是一位十分杰出的考古学家，他是我的好友波，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布罗教堂的著作。

我要求见米利埃先生，米利埃先生立刻亲自出来欢迎我。

我们握手寒暄一番后，我便把此行的目的以实相告。

“请放心，交给我吧，”他对我说，“我带您去我们这儿一个正在编写外省历史的地方官那儿。”

“他已经写到什么年代了？”

“一八二二年。”

“太好了。我要讲的是一七九九年的历史，而我的主人公是在一八〇〇年被处决的。他既然已经写到一八二二年，一定会知道我所需要的某些情况。我们动身吧。”

路上，我又得知这位地方官既是位渊博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

自布里亚——萨瓦兰以来，地方官对于食品越发讲究，并已成为一种风气。不幸的是，很多人仅仅是一些贪恋美味而不思进取之徒，二者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在地方官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一个精神焕发、眼神中颇有嘲笑意味的人。他用一种历史学家关照诗人的那种保护者的姿态欢迎我。

“如此说来，先生，”他问我，“您是专门为小说题材而来我们这种小地方访问的？”

“不是，先生。我的题材早已具备，只差历史材料了。”

“是吗！我真是难以相信花这么大力气仅仅是为了写一部小说。”

“不，先生，起码对我而言是这样。我早已形成了认真严肃地